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与理论特色*

罗建波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有着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对非洲前途命运的深刻理解，不断深化对中非合作价值与意义的总体把握，不断发展和弘扬中非合作精神，逐步形成了全面、系统而又特色鲜明的非洲观。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是党认识非洲与中非合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不断创新对非合作理论与政策的基础，是中非团结合作不断深化拓展的根本遵循。党的非洲观有着自身显著特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内在统一，坚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始终顺应南南合作的历史大势，注重发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党的非洲观有力塑造了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推动着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新的国际关系伦理和范式，有力促进了中国、非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关键词 中国外交 中非关系 中国共产党 非洲观 第三世界

作者简介 罗建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深切同情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立志要为广大劳苦群众求解放，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中国携手非洲国家，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联合反帝反殖反霸，到非洲国家独立后携手追求发展和复兴，始终着眼捍卫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切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经验总结和时代创新研究”（21AG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利益，始终着眼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中国共产党把非洲人民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推动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发展和复兴视为自己的道义追求。

中国共产党认识非洲和中非关系，从来都有大视野、大胸怀、大格局。一是大历史观，中国共产党善于以大历史观认识非洲发展大势，既看到了非洲国家追求独立和发展进程的艰辛与不易，又看到了非洲走向全面复兴的光明前景。二是全球纬度，中国共产党从全球纬度认识非洲的世界地位和价值，看到了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战略价值，看到了非洲历史发展对于国际体系演进的推动作用。三是南南合作视野，中国共产党从南南合作的角度认识中非合作的性质和意义，以及中非合作历史主题和任务的演变与调整，由此清晰地把握中非合作之于中国、之于非洲、之于发展中国家、之于世界的历史意义。

在长期的国际观察和对外交往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对非洲前途命运的深刻理解，不断深化对中非合作价值与意义的总体把握，逐步形成了全面、系统而又特色鲜明的非洲观。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非洲的历史地位、非洲的前途命运、中非团结合作的价值与意义，以及中国对非外交理念和政策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这是中国一贯重视非洲的观念基础，是指引中非团结合作不断深化拓展的根本遵循。通过中非合作的艰辛历程及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现了胸怀天下的理论品格，展现了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与世界责任。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系统阐述其理论与实践特色，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成就和经验的必需，是全面深化新时代中非团结合作的现实要求。

一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一演进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体系演进方向的准确把握、对时代主题演变的科学认识、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全球发展和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及对自身使命、责任与道义的深刻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非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一）1979年以前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致力从事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实现自

身发展壮大，党的对外交往对象主要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党的国际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开始关注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大陆的现实处境，深切同情非洲人民的历史命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把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势，深刻认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早在1939年9月，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的抗日政策时就指出，中国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外部援助，这些外援来自三个方面，即社会主义苏联、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①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深刻指出旧世界存在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他断言反动逆流总有一天要被克服。^② 中国共产党人把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把非洲广大被压迫民族视为中国革命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明确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选择，同时也认为自己属于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把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和正义事业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③ 新中国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视为团结的力量，誓言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扩张政策。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了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支持亚非民族独立斗争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与其他亚非国家一道缔造了反帝反殖、团结合作的“万隆精神”。新中国一经成立就有着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视野，有着关注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部环境异常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页。

广泛的反帝反霸外交路线，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先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大手笔地勾勒出国际矛盾斗争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在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中清晰指出了敌我友的关系，为中国找到了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力量。1963年12月至翌年3月，周恩来率团对亚非欧14个国家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期间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①和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②。在中国看来，通过支援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能够极大地履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义务，也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极大地配合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周恩来曾对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吻合做过阐释：“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③

中非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历史成就是显著的。中国借助第三世界的支持，在美、苏共同包围封锁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它们的帮助下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指出，这一重大胜利“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④中国在自身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予非洲国家力所能及的无私援助，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之一。1971~1975年间，中国援外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88%，1973年一度高达6.92%。^⑤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对非援助最具标志性的重大工程，这条长达1860公里的跨国铁路有力支援了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

① 关于“五项原则”具体内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② 关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430页。

③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⑤ 本刊记者：《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 孙广相谈援外体制改革》，载《国际经济合作》1993年第5期，第10~11页。

的斗争，奠定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曾这样称赞道：“中国一贯积极地、实际地支持非洲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取得彻底的解放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他说：“中国也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贵国给我们的援助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之间团结一致的例证。”^①

（二）1979～2012 年对非洲合作理念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冷战形势也明显缓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国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对国际形势有了全新判断，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外交诉求也由着眼国际政治斗争需要转向服务经济建设和国家全面发展，以及更大程度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与此同时，非洲的历史任务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伴随 1980 年津巴布韦的独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实现政治独立，反帝反殖斗争渐成历史，这些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着手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非洲外交的观念和政策在历史延续中发生了重大调整。不变之处在于，中国一如既往地重视非洲国家，继续坚持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1982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② 变化之处在于，中非合作逐步由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相互支持转向了对和平、发展和复兴事业的共同追求，南南合作的时代主题由此发生历史性调整。中非合作中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有明显淡化，以务实理性为特点的经贸合作开始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历史转型奠定了新时期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础，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中非合作的稳步发展呈现若干新的特点：一是合作内涵显著拓展。1982 年，中国政府总理在访非时宣布了对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在“四项原则”的指导下，中非经贸往来从过去由中国单方面提供对外援助逐步

^① [坦桑尼亚] 尼雷尔：《坦桑和中国的友谊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载《人民日报》1985 年 8 月 20 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15 页。

发展到互利合作、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经贸关系，日益体现出务实、平等、互惠互利的特征。中非经贸合作在经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整和发展后，进入21世纪后实现了长期、快速发展。^①二是合作层次不断提升。中非关系定位呈现不断跃升的态势，从1996年“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②，到2000年“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③，发展到2006年“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④。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亮点在于，既强调中非合作是相互尊重、完全平等、互惠互利的关系，又突出其“战略”价值，即中非合作的内涵和意义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三是合作形式不断创新。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搭建了一个政府间多边磋商与集体对话机制，为21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搭建了极为重要的制度平台。

（三）2013年以来对中非团结合作的认识与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推进，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显著加快。在中国大发展和世界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视野更加开阔，愿景更加宏大，既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民族夙愿，又要携手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的世界胸怀和全球担当。中非合作也有了新的愿景和目标，既需要通过南南合作不断拓展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携手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非洲的认识和把握、对中非合作的定位和期待，都有全新的内涵和表述。

^① 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105.9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08年的1068.4亿美元，首次跨越了1000亿美元大关，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33.5%。从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达到1984.9亿美元，接近2000亿美元大关。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30日。

^② 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非时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发展同非洲国家“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

^③ 在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非双方宣布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参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载《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10月13日。

^④ 2006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宣布致力于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在同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得到正式确认。参见《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二〇〇六年一月），载《人民日报》2006年1月13日。

第一，从世界大变局的宽广纬度把握非洲的发展大势及其重要地位。习近平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其中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这样说道，“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① 在过去非洲国家尚未取得政治独立的时候，中国就能够乐观预见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形势，看到非洲民族民主运动之于世界的重大意义。在当前亚非国家追求发展和复兴的时代，中国对非洲的发展和复兴同样充满期待，对南南发展合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部分西方人士把非洲视为“绝望的大陆”（Hopeless Continent）^② 或“白种人的负担”^③ 不同，与部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一度降低对非洲重视程度并相对疏远非洲不同，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把非洲视为全球的“机遇”而非“负担”，是“希望的大陆”而非“绝望的大陆”，看好非洲的发展前景和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非洲观一以贯之的重要方面，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更是如此。

第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视野认识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显著加剧，中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呈现显著复杂严峻，中国外部环境面临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中国要继续发扬统一战线思维，继续加强和拓展与非洲的团结合作，巩固战略依托，扩大回旋空间，利用非洲国家的整体力量制衡美国及其个别盟友对中国的可能阻遏，改变和优化中国的战略处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历史一再证明，在历史上的若干重大节点、重大事件中，非洲国家往往是中国撬动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支点”，是中国外交不可多得的伙伴和助力。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新方位，非洲国家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

^① 参见《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载《经济日报》2015年12月5日。

^② 英国《经济学人》曾在2000年5月以“绝望的大陆”推出封面文章，来表达对非洲发展的失望情绪。See “Hopeless Continent”, *The Economist*, May 13, 2000,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00/05/11/hopeless-africa>, 2022-01-20.

^③ 美国历史学家海斯（C. J. Hayes）等人曾在著作《世界史》中声称，“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参见[美国]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

削弱、只会加强。”^①

第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定位中非合作的世界意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全人类的重大愿景，前景十分美好，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不一，文化观念差异甚大，外交选择不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分国别、分地区、分领域、分层次予以稳步推进。携手与中国战略对接融洽、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双边和区域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积极的示范效应，共同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国家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是一条相对可行的路径。在“真实亲诚”对非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中非双方正在致力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全面打造中非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互鉴的合作新范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样板和典范。

二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重大思想与论断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非洲历史进程的认识、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把握，以及对中非合作价值、内涵和意义的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非洲和中非关系的总的思想与观点。

（一）对非洲前途命运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到非洲历史和文明对于人类发展的特殊价值，看到非洲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主实现自身发展的历史大势。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非洲和中非关系的重要认识基础。

第一，乐观认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势。毛泽东很早就密切关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发展态势。1945年4月，他曾预言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后，民主与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区。^②他在1956年8月会见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时说，“亚非会议召开后只不过一年多，万隆精神已发展得很快，影响很大。”他断言，

^①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页。

“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数很少，事实上根本不可怕。他们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了。”^①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罗金、杜特列夫人谈话中形象地说道：“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他还说，“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② 1964年1月，周恩来在访问几内亚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他欣喜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站起来了，他们决心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③ 正是基于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第三世界革命形势的充分肯定，新中国坚定地站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一边，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追求政治独立的正义事业。

第二，积极看待非洲的发展和复兴。1964年2月，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谈到，“我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他还补充说：“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非洲。”^④ 1989年3月，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和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⑤ 1996年5月江泽民在访非时称赞，20世纪是非洲的“解放世纪”，21世纪则是非洲的“发展世纪”，相信非洲发展将推动非洲社会实现又一个历史性跨越。^⑥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访问非洲时曾用三个“锐不可挡”^⑦ 来概括非洲的发展态势，并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2~2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3页。

④ 同上书，第400~40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30页。

⑦ 即：非洲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坚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独立自主势头锐不可当；非洲积极推进工业化，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快速发展势头锐不可当；非洲加快一体化进程，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用一个声音说话，联合自强势头锐不可当。参见习近平：《共同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5日。

上坚定认为“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满希望”^①。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的思维、发展的思维、辩证的思维，既能客观看到非洲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也对非洲发展充满信心，能够充分认识到非洲国家具有的良好发展条件以及不断提升的自主发展精神，能够积极肯定非洲国家在追求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历史成就。

第三，积极评价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非洲国家在追求民族独立时期是反帝反殖的重要力量，在赢得政治独立后又以其国家数量众多因而在重大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1964年1月，周恩来在访非时称赞，“新兴的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③具体来讲，“非洲在不结盟运动中约占半数，在联合国成员中占了近三分之一，始终是推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④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国更是把非洲视为推动世界发展、全球治理乃至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继续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自然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

第四，高度评价非洲国家的团结和统一。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非洲代表时讲道：“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他鼓励非洲朋友：“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⑤1964年2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谈到，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⑥中国曾长期支持非统组织及其解放委员会，给予非洲国家以经济、军事援助和外交声援。当前，中国积极支持非盟《2063年议程》，支持非盟提出的“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携手非盟更大程度推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进程。2013年5月25日，习近平致贺词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非盟特别峰会召开，称“全非洲是一

①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3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2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99页。

个体戚与共的大家庭”，相信非洲国家和人民大力弘扬泛非主义精神，坚持联合自强，一定能够推动非洲复兴事业迈上新台阶。^①

第五，充分肯定非洲文明的历史价值。非洲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对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和交流传播有着深远影响。^②早在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中就指出：“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③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用三个“极”来概括非洲的世界地位，即非洲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④中国尊重非洲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正确文明观，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

（二）对中非合作目标任务和价值意义的期待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非合作的目标与任务、价值与意义有过许多重大论述。这些论述体现着党认识中非合作的双重视野，既能从双边关系层面看到中非团结合作对于双方各自维护政治独立与主权、追求发展与复兴的重要价值，也能从全球纬度看到以中非合作为引领的南南合作之于世界发展、全球治理乃至国际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

第一，“非洲是斗争的前线”。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非洲是斗争的前线”。^⑤这个斗争的性质和目的，就是“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⑥第三世界团结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双向的互信互助，自身力量弱小的非洲国家在面对强大殖民宗主国时多了一份坚定的支持力量，同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也可以极大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有助于迅速打破中国面临的外部封锁，极大改善中国

^① 《习近平致贺词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非盟特别峰会召开》，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27日。

^② 李克强：《开创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非盟会议中心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6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6~157页。

^④ 参见《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5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32页。

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如1960年5月毛泽东对非洲来华代表说的那样，“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斗争也是你们的斗争，我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①中国和非洲原本地理遥远，但在追求政治独立、捍卫民族尊严的正义斗争中坚定地走到了一起，成为可以长期相互依赖的帮手和助力。

第二，关注“南北问题”和“南南合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非合作在继续强调政治互信的同时，开始更多着眼追求经济发展，着眼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南南合作因而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强调，“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要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②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他特别强调，解决南北问题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③此后，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历任国家主席都十分重视全球发展问题，把推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问题视为中国重要的国际贡献。2021年9月，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做重要发言，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以推动国际社会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④

第三，中非是“全天候”朋友。1996年5月江泽民在访非时指出，中非双方是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⑤他强调，“我们必须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富朋友要交，穷朋友也要交，关键时刻往往穷朋友更靠得住。”^⑥胡锦涛对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有过深刻阐述，称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过去、现在、将来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④ 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28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是我国特有的政治和外交优势。”他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工作做好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基础就更加坚实，就可以更好地在大国间纵横捭阖，更好运筹周边外交”。^① 非洲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非洲。帮助非洲，就是帮助中国自己。

第四，“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访非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因为“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② 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呼吁中非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③ 2020年6月，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呼吁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充分发挥中非合作在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中的积极意义。^④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最早提出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其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中非南南合作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通过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积累实践经验。中非命运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有着超越双边层面的全球性意义。

（三）对国际统一战线思维的阐述和运用

如何实现中非团结合作的愿景和目标，更好维护中国、非洲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其中之一即“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⑤ 1964年7月，毛泽东对非洲朋友指出，亚非拉人民“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⑥ 非洲国家和人民自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弘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借助非洲国家显著拓展了自身外交空间，同时也极大支持了非洲国家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6~97页。

②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2~13页。

③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第137~138页。

④ 习近平：《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244~245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9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86页。

革命和建设事业。

第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论断。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①这是“中间地带”的最早表达。1955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时曾专门谈到“中间地带”，指出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洲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②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论断。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③1964年1月和7月，毛泽东先后会见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士，再次详细阐述了“两个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他还指出，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④“两个中间地带”显著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视野，为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对峙之外找到了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其中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和人民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

第二，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两个中间地带”战略判断基础之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战略思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⑤当时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方向，就是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第一世界。“三个世界”划分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最为集中的体现和运用，它大手笔地把中国与世界大多数的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团结在了一起，最大程度地孤立了对手，壮大了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其中，以非洲国家为主的第三世界是中国外交的基础，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团结第三世界也自然成为中国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2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3页。

④ 同上书，第344~345页。

⑤ 同上书，第441~442页。

际统一战线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并坚定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这一身份定位及战略选择就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历史起点。

第三，表明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在中非联合反帝反殖反霸时代结束以后，中非合作的主题和任务发生了显著调整，但中非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仍面临许多相似的利益需求，一如既往地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仍是中国重要的外交选择，一如既往地弘扬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思维仍然有着重要意义。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①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②

第四，表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是“天然同盟军”。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③天然同盟军是对世界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战略价值的准确认识，是对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准确定位。这里所言同盟军，并非西方语境中的政治或军事结盟，而是意在表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长期是志同道合、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关系。在世界大变局时代，以非洲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大有可为的地方，是在复杂国际形势中下先手棋、打主动仗的重要助力者，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减贫和发展的重要伙伴，是在国际体系中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积极力量。中非团结合作对于中国、对于非洲、对于世界都有全新的意义。

（四）对中非合作精神的发展与弘扬

中非关系为什么好？中非友谊为什么深？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精辟指出，关键在于中非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好合作精神，那就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① 中国在对非合作中始终践行“四个坚持”和“五不”原则，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非合作共赢之路。^②

第一，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内政为基础培育政治互信。196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朋友时讲到，“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③ 同年7月，他在接见亚洲、非洲、大洋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进一步表示，“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④ 胡锦涛于2006年4月访问非洲时，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概括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⑤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非时再次强调，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我们双方谈得来，觉得相互平等；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⑥ 在长期的对非外交实践中，中国从不以“教师爷”自居，不以大党大国自傲，始终基于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理解和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特别是，中国对非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这与西方大国对非援助大多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截然不同。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在1985年8月访华时曾动情地说：“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⑦

第二，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导向做大共享利益。长期以来，中非互为对方发展的重要机遇，双方在资源禀赋上互通有无，在生产要素上取长补短，在发展经验上互学互鉴。当前中非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把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422页。

② “四个坚持”，即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五不原则”，即中国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新时代的中非合作》，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7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86页。

⑤ 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⑥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3页。

⑦ [坦桑尼亚]尼雷尔：《坦桑和中国的友谊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载《人民日报》1985年8月20日。

“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不断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合作亮点。从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到“九项工程”，从非洲“三网一化”到中非产能合作，中国通过对外援助和投资在非洲修建了诸如蒙内铁路、亚吉铁路、阿卡铁路等一大批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通过诸如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塞东方工业园、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等经贸合作区助力非洲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无须讳言，中非合作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本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正常现象，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方式予以解决。无须讳言，中国对非外交有自身的利益考量，比如拓展外部发展空间、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但中国对非外交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是相互分享发展机遇，实现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第三，以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互信互助为路径共担全球责任。中非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全球治理中拥有广泛的共同责任，双方在联合国等重大国际舞台一直相互支持，在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方面一直携手合作。中国一再承诺，将继续在联合国等场合为非洲仗义执言、伸张正义，支持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正如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坚定承诺的那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① 长期以来，中国把非洲视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地区，把中非合作视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把推动非洲发展和复兴作为自身大党大国道义精神的重要体现。为支持非洲国家的抗疫行动，在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郑重宣布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帮助非盟实现2022年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②

第四，以革命和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为牵引塑造价值共识。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会见非洲国家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时鼓励他们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对非洲朋友讲，“有些经验也许可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290页。

^②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424页。

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 and 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① 邓小平也注重向非洲朋友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强调非洲需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强调，“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② 21世纪以来，中非双方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不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在完全平等、双向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文交流和经验互鉴，成为中非关系的一个突出亮点，成为中非合作不断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方面。^③ 中非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的互学互鉴，不只是着眼增进相互了解和包容，从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还在于培育观念和价值共识，在共同建设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之外搭建起文化、思想、观念层面的知识共同体，这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的重要基础。

第五，以“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彰显国际道义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④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郑重宣示，“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⑤ 正确义利观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全面、系统阐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利”的理解，深刻回答了不断发展的中国如何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这一重要问题。其实践要求就是要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兼顾、弘义融利，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完全平等，在经济上追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作并追求国际秩序的公平和正义。在对非交往中弘扬“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是对几十年中非合作精神的提炼和升华，集中表达了新时代推进中非友好合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140页。

③ 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开创性地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首份对外政策白皮书《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把“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确定为对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四项原则与目标之一，明确提出中非双方“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发展的经验，……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治国理政经验”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词汇被明确提出来。参见《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二〇〇六年一月），载《人民日报》2006年1月13日。

④ 马占成：《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⑤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第135页。

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集中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所应当坚持的外交道义和精神。

三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理论特点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和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主动回应中国和非洲的历史任务和需要，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显著特点的非洲观。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把握世情、党情、国情，理性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突出体现在：一是历史的思维。毛泽东曾明确阐述过认识非洲前途的历史思维，他在1964年7月接见亚洲、非洲、大洋洲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表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②习近平也强调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全局观、角色观把握国际形势，这里的历史观就是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正确把握历史大势。^③二是矛盾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辩证思维，能够准确把握非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坚定支持非洲革命和发展的正义斗争。三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时俱进地把握中国、非洲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中非合作的内涵和形式，不断完善对非战略与政策。

（二）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内在统一

毛泽东曾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④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把推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83页。

^③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种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初心使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具有的“大同”思想和“天下”情结。周恩来曾指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①中国在自身经济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经济发展给予了大力帮助，当前更是主动通过“一带一路”推动非洲经济发展，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推动非洲文明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又是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着内在的统一，无论是过去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还是新时代的南南合作，其中之一重要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要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着眼推进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夙愿。习近平精辟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内在统一，是理解中国对非外交价值取向的双重维度。

（三）坚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

新中国深切同情广大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坚定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这一身份定位从根本上塑造着新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内在影响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20世纪后期以来，随时国际形势的演变，中国开始更多使用“发展中国家”而非“第三世界”的概念。不过，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当代“发展中国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第三世界”的延续和发展，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也与过去亚非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一脉相承。虽然第三世界各国早已实现了政治独立，但这些曾经在追求民族独立过程中携手前行的亚非拉国家仍然面临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在国际事务中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发展中国家绝非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属性。这一概念既承载一种历史记忆，又有一种现实需要，因而有着一种特殊的归属感、亲近感、认同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一再承诺将始终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关注，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的“初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3页。

^②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199页。

（四）始终顺应南南合作的历史大势

新中国成立后，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视为被压迫民族和新生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积极关注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把它们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把支持第三世界革命视为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支持埃及、阿尔及利亚反抗外部统治、干预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支持南部非洲国家实现反殖反种族主义斗争，以及在此期间对非洲已独立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都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精神。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后，中国及时调整中非合作的内容与形式，携手非洲国家追求发展和复兴，共同维护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权益。当前，中国更是着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愿景赋予中非合作以新的使命和任务，呼唤中非携手打造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价值共享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树立典范和起到引领作用。

（五）注重发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注重把统一战线思维运用于外交领域，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部理解和支持。在中国外部环境异常困难之时，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战略判断和“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定支持，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同样重视发扬国际统一战线思维，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天然同盟军”，把中非团结合作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通过新时代南南合作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复兴进程。中非团结合作彰显了两点道理：第一，中国不需要政治和军事同盟，但中国也需要战略上的助力和伙伴；第二，帮助非洲，其实也是帮助中国自己。

百年来，中国国际统一战线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即善于研判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善于把握国际力量对比大势，始终团结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始终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善于把握时代主题，始终着眼应对和解决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始终注重推动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完善。中国国际统一战线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新内涵新特点：由着眼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斗争合作”，转向在重大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以及共同追求经济发展和复兴的“发展合作”和“治理合作”；由从外部推翻“旧世界”，即

打破旧的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到携手各国建设“新世界”，即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划线的斗争哲学，演变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新思维，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就是新时代伙伴关系思维的集中体现。

四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政党。党始终把非洲自然视为自身践行世界理想、彰显大党大国抱负的重要区域，始终把中非合作视为经略外部环境、运筹外交布局的关键环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发展与演变，是党的民族使命和全球责任共同作用的产物，直接体现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任务的变化，直接反映着第三世界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深受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演进的影响。在党的非洲观的指引下，中国对非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既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国际体系的变迁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塑造了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有着胸怀天下的理论品格。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前更是携手非洲国家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变革，体现了对公平与正义国际秩序的追求。中国在对非交往中积极弘扬“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致力于实现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体现了对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坚定捍卫，是对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轻视甚至忽视发展中国家应有权益的重大纠偏。中国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情怀，积极推动中非人文交流和文化互鉴，深入推进中非发展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非洲国家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提出并不断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①，其重要诉求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携手发展中国家解决紧迫的发展和治理难题，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就是要积极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第286页。

弘扬民主和自由这一人类共同价值，同时又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权利，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在价值追求普遍性与实践方式多样性上的有机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自然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关怀，又着眼人类社会共同福祉，集中表达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深切关怀，清晰展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应有发展方向的重大关切，因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道义精神。

（二）推动了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非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沃土，中非合作的理念和原则为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灵感，中非合作的政策与举措为中国外交的战略和政策的不断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素材。中国提出发展与民族独立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亚非会议形成以反帝反殖为旗帜的万隆精神，向世界表达了新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在中国外交特殊困难时期，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战略判断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为中国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制定外交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遵循。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以及中国积极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都蕴含着对发展中国家应有权益的重大关切。习近平提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大论断，重要依据之一便是一大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路径之一便是把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在实践层面，中国对非外交政策和举措，比如对非援助政策的不断完善、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与亚丁湾护航、中非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对推进中国外交实践创新有着重要的经验性、启发性。

（三）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新的国际关系伦理和范式

“倡议外交”是中国外交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特点，即通过向国际社会提出价值倡议、原则倡议、方案倡议，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以党的非洲观为引领，中非合作弘扬互信互助互惠的精神，在政治上坚持相互平等、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经济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人文交流中坚持求同存异、互学互鉴的传统。新时代中非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用行

动而非语言践行着“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从而与西方国家仍然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傲和自大形成鲜明对比，与国际体系仍然残留的零和博弈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存在根本区别，与西方现实主义片面强调自身利益做法更是形成了显著差异。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上指出，“六十五年来，中非双方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在发展振兴的征程上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谱写了守望相助的精彩篇章，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①

（四）促进了中国、非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以非洲观为引领，始终准确认识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大势，善于把握中非合作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的变迁。历史上中非联合反帝反殖反霸，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兴起，有力埋葬了西方殖民体系，极大改变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家间交往原则，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才得以真正成为全球性体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20世纪的历史已经……导致了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改变，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② 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绝不只是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单线条”演进，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式，而是有着更为复杂、多元的演进逻辑，第三世界团结合作在推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标志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开始进入国际舞台重心并彰显着自己的独特价值。新时代中非合作同样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通过中非携手合作助推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通过中非互帮互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通过新时代南南合作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伴随新时代南南合作的稳步推进，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呈现更加自信的发展态势，带来了世界财富、权力和文明格局呈现结构性变迁的新趋向，对于改变几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中非合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史晓曦）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422页。

^② [英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